

道德假言推理何以有效?

——非认知主义者对“弗雷格—吉奇问题”的解答*

杨 松/文

提 要: 吉奇认为,如果非认知主义者关于道德判断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予以认可并经常使用的道德假言推理在逻辑上就是无效的。为了解决道德假言推理的有效性问题,非认知主义者在坚持关于道德判断的非认知式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黑尔的“断言—意义分离”论证、布莱克本的“态度自洽”论证和格巴德的“规范谓词改写”论证为代表的三种解决方案。总的看来,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非认知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中越来越多地吸收了认知主义的合理部分要素,在坚持道德判断的情感表达、行为引导等主要特征的前提下,越来越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当人们通过逻辑推理获得各种道德知识时,需要以适时地承认、重视道德判断的描述性特征为基础。

关键词: “弗雷格—吉奇问题”; 道德假言推理; 非认知主义; 黑尔; 布莱克本

中图分类号: B81-051

文献标识码: A

一、“弗雷格—吉奇问题”

道德判断究竟是关于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的描述,还是仅仅是人的主观态度、情感、意志向世界投射(project)的产物,这是西方元伦理学中的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这两大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认知主义者认为,正如存在客观的经验事实一样(如中国的国土上存在喜马拉雅山),也存在客观的道德事实(如偷窃这个行为中存在“错误”这种性质),因此道德判断(如“偷窃是错误的”)本质上就和人们常见的事实陈述判断(如“中国有喜马拉雅山”)一样,“描述”了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而非认知主义者则往往否认存在客观的道德事实。他们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客观的道德性质,当人们说出道德判断的时候,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情感、态度、意志等投向事物,从而“表达”自己对事物的情感态度,或者

*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分析与规范判断”(项目编号:12YJC720048);2015年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近四十年来西方元伦理学的新进展研究”(项目编号:20720151166)的阶段性成果。

对某些特定行为的“引导”或者“规定”。因为从“意义用法论”的角度出发，非认知主义者把道德判断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阐发了出来，揭示了以“表达情感”、“评价事物”和“规定行为”为特征的道德判断与以“描述事态”为特征的事实判断之间最为显著的区别，所以非认知主义的理论一度在西方元伦理学界各派的争鸣中占据上风。

但是，英国的逻辑学家 P. 吉奇 (Peter Geach) 认为，如果按照非认知主义的观点来理解道德判断，那么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道德假言推理就无法继续适用，这显然是人们难以接受的。为了明确吉奇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这样一个假言推理：

前提：(1) 天上在下雨。(2) 如果天上在下雨，那么地上会湿。

结论：(3) 地上会湿。

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推理，但是关于这个推理，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首先，(1) 和 (2) 都是对事态的断定，但是 (1) 断定的是“天上在下雨”这个事态，而 (2) 却没有断定“天上在下雨”，而是断定“‘天上在下雨’和‘地上会湿’之间具有充分条件关系”这个事态。换言之，(1) 要断言的就是句子本身表达的内容——“天上在下雨”，而 (2) 要断言的是“‘天上在下雨’是‘地上会湿’的充分条件”。“天上在下雨”并不是这个句子要断言的，仅仅是作为一种引用被提及。^①

其次，要使得上述假言推理是有效的，那么虽然 (2) 中并没有断定“天上在下雨”这个句子，但是它被作为一种“引用”或者“提及”，必须和 (1) 在逻辑上是同一的——“天上在下雨”不管是在 (1) 还是在 (2) 中，其意义都不改变，都是对相同事态的刻画。这是因为，“ $\therefore p, p \rightarrow q \therefore q$ ”这个推理要能够有效，必须满足“在这个推理中所有的 p 都是逻辑上同一的，q 也是逻辑上同一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说“p”和“ $p \rightarrow q$ ”中的“p”是同样的意思，两者必然具有相同的真值条件。“ $p \rightarrow q$ ”中的“q”和结论中的“q”也是同样的意思，也必然具有相同的真值条件。相反，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推理不能有效地进行。元伦理学家 A. 米勒 (Alexander Miller) 举了一个例子，对此作出说明：

前提 1：我的啤酒瓶有一个盖子 (head)。

前提 2：如果某样东西有一个头 (head)，那么它肯定有眼睛和耳朵。

结论：我的啤酒瓶有眼睛和耳朵。(Miller, 2003: 41)

显然这是一个无效的推理，因为在英文表达中，尽管前提 1 和前提 2 在形式上都有“head”这个词，但是在两个句子中，“head”的意思是不同的（因为两个“head”有不同真值条件，前者为“真”的条件是啤酒瓶确实有盖子，而后者为“真”的条件是某物确实有头），两个相同文字形式的“head”在逻辑上是不同一的。

^① P. 吉奇指出，像“如果那个警察说的是真的，那么……”和“如果那个东西看起来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假言条件句，前件部分并非是说话者所断定的内容，人们既没有肯定那个警察说的是真的，也没有声称那样东西是红色的，他们只是说，这些情况在整个充分条件句的逻辑结构中扮演着前提的角色。(cf. Geach, 1965: 462—463)

最后,要判断这个推理是否有效,只要看看能否画出这样一张真值表,在其中前提都为真,而结论为假。如果存在这样一张真值表,那么该推理就是无效的;如果不存在,那么该推理就是有效的。

在明确了以上三点以后,我们下面来看吉奇提出的这个推理:

(4) 折磨猫是错误的。(5) 如果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6) 因此,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② (Geach, 1965: 463)

这个推理和前文提到的第一个推理在形式上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前一个推理出现的都是事实判断,而这里出现的是道德判断,但是因为两者有完全相同的逻辑结构,所以人们通常都会承认,这个推理也是有效的。但是吉奇认为,如果按照非认知主义的观点来理解道德判断,那么该道德假言推理存在很多会导致其失效的问题:

第一,“折磨猫是错误的”在(4)和(5)中并不是逻辑上同一的。在(4)中,断言的就是“折磨猫是错误的”,而根据非认知主义的观点,如果人们断言说“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句子并没有描述“折磨猫”具有“错误”这种性质,而是对“折磨猫”的不赞成情感的表达(情感主义)或者从事规定人们不要折磨猫的言语行为(规定主义),因而根据非认知主义的观点,“折磨猫是错误的”这个句子在(4)中具有的就是某种非认知意义。而在(5)中,“折磨猫是错误的”作为充分条件命题的前件,只是被“嵌入”(embedded)整个句子,并没有被断言(被断言的仅仅是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充分条件关系)。因此,既然人们并没有断言说“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也就没有关于“折磨猫”作出任何情感表达或者行为规定。这样,“折磨猫是错误的”在(5)中就不具有非认知意义。由于“折磨猫是错误的”在(4)和(5)中意义不同,所以它们并非逻辑上同一,上述道德假言推理看起来是无效的。

第二,其实人们甚至也无法直接判断这个推理是否有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推理是否有效,只要看看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真值表,在其中前提都为真,而结论为假。但是在上面这个推理中,不管是前提还是结论,都含有道德判断,而根据非认知主义的看法,因为道德判断本质上不是描述性的,所以没有真假可言。因此,关于上述推理,既然人们甚至无法画出一个真值表,那么当然更无法据此判定其是否有效。

如果非认知主义关于道德判断意义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上述假言推理是无法进行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道德假言推理是得出道德知识从而获得行为引导的有效方式,它与关于陈述性判断的假言推理都符合从“p”以及“ $p \rightarrow q$ ”推出“q”的基本形式,理应有效。因此,并非道德假言推理不可行,而是非认知主义的理论存在可商榷之处。因为吉奇的上述观点对弗雷格的思想多有借鉴和发挥,所以西方元伦理学界也往往将这一问题称为“弗雷格—吉奇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对非认知主义的理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解决“弗雷格—吉奇问题”,就成很多非认知主义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②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笔者在引用这个例子的时候,做了部分改动,并且为前提和结论加上了编号。

二、非认知主义者的解决方案

1. R. M. 黑尔的解决方案

R. M. 黑尔 (R. M. Hare) 关于道德判断的意义的理解建基于其“言语行为理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该词具有的这样一种功能: 使用含有该语词的句子就是通过该句子做事, 而说出含有这个词的句子本身直接就是在从事相应的言语行为。(Hare, 1970: 4) 例如, 根据这一理论, 黑尔认为当说出道德判断“撒谎是错误的”时, 主要就是在从事“引导人们不要撒谎”的言语行为,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非认知主义观点。

黑尔认为, 只要具备如下三个条件, 道德假言推理就可以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内有效: 第一, 人们明白“如果……那么”句型的意思, 即“理解其逻辑地位(也就是明白它的逻辑性质)”, 会承认当以“如果 p, 那么 q”和“p”为前提的时候, 能够有效地推出“q”即承认肯定前件式。第二, 通过言语行为理论, 人们明白当“如果”和“那么”后面的句子没有被“嵌入”该句型中的时候, 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在上述例子中, 我们明白, 当没有在假言条件句中时, “折磨猫是错误的”和“让你的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分别是什么意思。而为了理解这两个句子的意思, 我们不得不诉诸言语行为理论, 然后明白当说出“折磨猫是错误的”时, 就是在从事“引导人们不要折磨猫”的言语行为, 而说出“让你的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时也是在从事“引导听者不要教唆自己的兄弟折磨猫”的言语行为。第三, 当“折磨猫是错误的”和“让你的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被嵌入“如果……那么”句型中后, 再加上前提“折磨猫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地推出结论: “让你的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 因为尽管“折磨猫是错误的”, 确实在两个不同的句子中存在着被断言的和未被断言之分,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个不同的句子中, 它的意义是有区别的(因为都是通过当其被断言时的言语行为来解释的), 有区别的地方仅仅在于, 当“折磨猫是错误的”被断言时, 关涉其意义的言语行为是直接表现出来的, 而在当其未被断言时, 该言语行为没有直接表现出来——“被断言”与否并不导致同一个句子的意义有所不同, 只会导致用于解释它的言语行为是否实际地表现出来而已。(cf. Hare, 1970: 16—18)

黑尔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是: 道德判断的意义与当其被断言时所从事的特定类型的言语行为有密切关系(从事何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就具有何种类型的意义), 而当其被断言时, 该种类型的言语行为被实际地表现出来, 未被断言时则没有表现出来, 因此影响道德判断意义的不是其被“断言”与否, 而是其对应的言语行为的类型。所以, 在上述假言推理中, 道德判断不管是否被断言, 其意义总是保持不变, 该推理也是有效的。

2. S. 布莱克本的解决方案

S. 布莱克本 (Simon Blackburn) 把道德判断视为人的情感、态度向世界投射的产物, 因此当说“X 是正当的”, 就是表达了对 X 赞成的情感, 当说“X 是错误的”, 就是表达了对 X 不赞成的情感, 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非认知主义(学界也往往将其理论称为“投射主义”)观点。为了解决“弗雷格—吉奇问题”, 布莱克本提出了“态度自洽”论证。^③

在布莱克本看来, 人都有所谓的“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bility), “它具有通过输入

^③ 布莱克本关于“弗雷格—吉奇问题”的解答有诸多方案(参见张曦, 2011), 不过其面临的困难其实有类似之处, 我们这里仅根据其中一个方案进行探析。

信念而输出态度”的功能,也就是说,关于任何一个事实性的信念,人们总是可以在“道德敏感性”的作用下输出相应的态度,例如,通过输入“张三撒谎”这一信念就可以输出关于该信念的不赞成的态度。就此而言,所有的道德判断实际上都可以改写成一种由“信念”和在“道德敏感性”作用下所产生的“态度”相结合的语言形式。布莱克本将这种语言形式称为“ E_{ex} ”。在该语言形式中,有基本的态度算子“ $H!$ ”和“ $B!$ ”,分别表示赞成的态度和不赞成的态度。在态度算子后面通过括号将“信念”的内容囊括在内,表示态度所针对的对象。(cf. Blackburn, 1984: 193) 例如,日常语言中“张三撒谎是错误的”,在“ E_{ex} ”这种语言形式中就可以改写为“ $H! (张三撒谎)$ ”。当然,日常语言中除了出现“张三撒谎是错误的”这种简单的道德判断,还会出现复合形式的道德判断。吉奇所提出的“如果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让你的小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于这种假言条件句的道德判断,布莱克本认为在“ E_{ex} ”中可以改写成“ $H! (\mid B! (折磨猫) \mid ; \mid B! (让你的小弟去折磨猫) \mid)$ ”。在这个表达式中,最外层的括号里面包含了两个用分号隔开的部分——“ $\mid B! (折磨猫) \mid$ ”和“ $\mid B! (让你的小弟去折磨猫) \mid$ ”,这两部分分别表达了关于“折磨猫”和“让你的小弟去折磨猫”的不赞成的态度。而这两个部分又被括号进一步囊括起来,前面加上了“ $H!$ ”,实际上表达了对上述两种态度组合的态度,是关于态度的态度,也就是所谓的“二阶态度”。就是说,在布莱克本这里,任何一个日常语言中包含道德判断的假言条件句,实际上都可以在“ E_{ex} ”中改写成为一个“二阶态度”的句子,它实际上表达的是关于分句中的态度或者信念的“态度”。(Blackburn, 1984: 194)

通过使用“ E_{ex} ”,吉奇前面提到的那个推理就可以被改写成下面这种形式:

前提 1: $B! (折磨猫)$

前提 2: $H! (\mid B! (折磨猫) \mid ; \mid B! (让你的小弟去折磨猫) \mid)$

结论: $B! (让你的小弟去折磨猫)$

布莱克本指出,任何人只要他的“道德敏感性”是正常的,都必须承认上述推理的有效性,否则他的情感态度就是前后矛盾的——一个同时具有“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和“赞成‘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以及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去折磨猫的态度’”的态度的人,不可能不形成“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去折磨猫”的态度,否则他的“道德敏感性”就是自我挫败的。(Blackburn, 1984: 195)

布莱克本解决方案的核心是:简单句形式出现的道德判断是表达“一阶态度”的句子,(内嵌道德判断的)假言条件句子是表达“二阶态度”的句子,道德假言推理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一方面作为前提的句子都是属于同种类型的表达态度的句子,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只要其道德敏感性不是矛盾或者自我挫败的,就不可能在承认前提(具有前提所表达出的各种态度)的同时,否认结论(即不具有结论所关涉的态度)。

3. A. 格巴德的解决方案

A. 格巴德(Allan Gibbard)认为,当人们说出一个道德判断时,并非是要刻画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而只是表达对涵盖该道德判断的整个规范系统的“接受”,这一观点常常也被学界称为“表达主义”(Expressivism)。例如,人们经常会说“张三撒谎是错误的”,其

实当说出这句话时，不仅仅是关于“张三撒谎”这一个行为作出评价，因为在“张三撒谎是错误的”这一个道德判断背后，有一个一系列与该规范相关的诸道德判断（如“总是做正义的事情”和“错误的行为总是须得禁止”等）构成的规范系统N，而当人们接受“张三撒谎是错误的”时，也就是对其背后的整个规范系统的接受。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实际上往往是接受了一般的规范性原则，然后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符合规范性原则所涉及的那些情形，最后得出比较特殊的判断。例如，人们可能接受了“在通常情况下，禁止撒谎”这条规定，那么当遇到张三说假话的情形时，人们是否可以把他的行为视为“撒谎”，他所处的情形是否属于规范性原则所指涉的“通常情况”，然后决定就张三的行为得出何种道德判断。推而广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接受的甚至并非只是一条规范性原则，而很有可能是由若干规范性原则以及由它们推导出的各类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当人们表达出道德判断以表示对某些规范性行为的“接受”时，实际上也是在表达对其背后的整个规范系统的“接受”（例如，当人们说“张三不应该撒谎”的时候，不仅是对“禁止撒谎”这个一般性原则的接受，甚至也意味着在接受一系列与之相容的若干条规范，如“正义”、“诚信”和“友善”等）。正是因此，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就可以发现，如果某个规范系统N足够完备，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或一类行为，其实我们都可以在N中找到与该行为有关的特征——它在该规范系统N中是“被要求的”、“被允许的”或者“被禁止的”，这些特征可以分别用谓词“N-被要求的”、“N-被允许的”和“N-被禁止的”来表示。格巴德认为，“这些谓词是描述性而不是规范性的：这是说一个事物或者行为是否是N-被允许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Gibbard, 1990: 87）也就是说，就规范系统N内部来说，任何一个或一类行为规范，它所指涉的行为具有“N-被要求的”、“N-被允许的”和“N-被禁止的”这三种特征的哪一种，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规范性问题，而上述谓词具有的只是描述性力量而非规范性力量。格巴德通过上述方法，实际上已经可以很便利地解决“弗雷格-吉奇问题”，对一个关于整个完备的规范系统N和相关事实了如指掌的人而言，吉奇前面提出的那个道德假言推理实际上就可以转化成如下形式：

前提1：折磨猫是N-禁止的。

前提2：如果折磨猫是N-禁止的，那么让你的小弟弟折磨猫是N-禁止的。

结论：让你的小弟弟折磨猫是N-禁止的。

由于“N-禁止的”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语言，因此上述推理和一般事实判断的假言推理并没有实质区别，也应该有效。

格巴德解决方案的核心是：在人们接受的规范系统N中，任何一个规范判断中的规范词都可以转化为具有描述性特征的“N-被要求的”、“N-被允许的”和“N-被禁止的”这三种谓词之一，从而将道德判断转化为描述性判断，道德假言推理转变为描述性的假言推理。

三、关于非认知主义者解决方案的评析

就黑尔的解决方案来看，他没有能够在坚持意义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说明当道德判断被嵌入假言条件句的前提从而未被断言时，何以可能具有和原来被断言时的句子一样的意义。黑尔强调，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人们使用它所从事的特定类型的言语行为所决定的，

正是因为道德判断是用于评价事物、引导行为,而事实判断是被用于描述事态,因此道德判断和事实判断也会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类型。至于句子本身是否被断言,和它的意义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影响其所对应的言语行为是否需要具体地表现出来而已。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断言”真的只是影响言语行为是否表现出来,而和句子的意义没有直接关系吗?其实并非如此。当一个句子被使用的时候,究竟从事的是何种类型的言语行为,实际上也只有根据其实际被说者“断言”时的语气、姿态、周边环境等各种要素的综合判断才能最终确定。只有当人们诚恳地说出“张三是个好老师”的时候,这个句子才是一个对张三积极评价的句子,它显然和人们阴阳怪气地说出这句话时所从事的言语行为不一样。一位天气预报员对着镜头播报“外面在下雨”时所从事的言语行为或许是“描述”,但是当她作为母亲对即将出门的儿子关切地说出同样句子的时候,更可能是在从事“要求儿子带雨具”这样一种行为引导的言语行为。因此,当“断言”没有实际作出,当“断言”所伴随的各种因素没有被了解时,一个句子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是不确定的。可见,按照黑尔所坚持的言语行为理论,并不能说明“折磨猫是错误的”在两种不同情境下(在一个前提中被断言,在另一个前提中未被断言)为什么会具有相同的意义(即为什么是在从事相同的言语行为),甚至人们很难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出,未被断言的句子本身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黑尔没有在语言行为理论的框架内说明,假言条件句“如果……那么……”本身以及被嵌入其中的道德判断,究竟从事的是何种言语行为,但是布莱克本的“二阶态度”理论毕竟为假言条件句提供了某种“投射主义”式的解释,认为道德假言条件句本质上是关于“嵌入其中的诸道德判断所表达的态度”的态度,从解决方案与基础理论协调性的角度来说,布莱克本确有进步之处。但是,总的来看,布莱克本的解决方案仍然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第一,布莱克本关于道德假言条件句的改造实质上是一个关于“态度”的态度,即一个“二阶态度”;还是关于“态度的信念”的态度,从而仅仅是一个“一阶态度”,他本人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根据他关于“道德敏感性”的解释,其功能是通过输入信念来输出态度,可见它的作用方式是针对“信念”作出反应,从而输出关于信念的态度。因此,当他借助“道德敏感性”的概念和 E_x 语言形式,把“如果折磨猫是错误的,那么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是错误的”改写成 $H!(\downarrow B!(折磨猫)\downarrow;\downarrow B!(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downarrow)$ 时,实际上并不应该说这是关于两种“态度”输出“态度”,而应该说是通过输入“‘我有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和‘我有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的态度’”的信念,从而输出关于这两个信念联言体的“赞成的态度”。说人们可以通过“道德敏感性”针对某种事实性的信念输出态度,甚至通过输入“关于态度的信念”从而输出相应的态度,这都是我们的常识可以理解的,但是说人们可以直接针对态度本身输出态度,这往往令人费解。第二,布莱克本指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拥有正常的道德敏感性,那么当他同时具有两种态度:(1)“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和(2)“赞成‘不赞成折磨猫的态度以及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的态度’”的态度的时候,就必然会得出“不赞成让你的小弟弟去折磨猫”的态度,否则其道德敏感性就是自我挫败的,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一推衍过程究竟是理性的(即关涉逻辑的客观必然性),还是非理性的(即关涉情感上的主观意志的自我协调)?

事实上,源自理性的结论和源自情感态度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别。假设一个人不承认 $2+2=4$ 或者不承认逻辑结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纠正他,例如

通过列举事实来进行归纳告诉他数学等式的正确性,或者通过高级演算的方式来证明数学和逻辑规则的必然性,这是理性的过程。但是,同样的方式却难以在情感态度的问题上适用。一个人完全可以在对所有事实了解清楚的情况下,依然在态度上和他人保持一致。例如,烟民完全可以像我们一样对吸烟给身体带来的不利后果了如指掌,但是这或许并不妨碍他对烟草有非常狂热的喜好。一个人也可以对同样类型的事物或者行为产生不同的情感态度,例如,他觉得自己不能见义勇为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他人不去见义勇为,他却又颇有微词。甚至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同一个行为,人们可能也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态度,例如,恋爱时的谎言被理解为爱意,而进入婚姻之后的谎言却被理解为背叛,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这样一种情感态度上的“不一致”或者“自我挫败”能够用理性或者逻辑的方式来予以解决吗?事实表明,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在处理情感态度的问题时并不总是那么有效,可见理性逻辑方面的“挫败”和情感态度方面的“挫败”是完全不同的类型。那么,回到上面的论证来看,既然以“情感”为主要对象的上述推衍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非理性过程,那么情感态度上的不一致也只是主观喜恶上的“自我挫败”,我们当然未必也要承认这同时还是一种逻辑上的不一致^④。

黑尔和布莱克本之所以面临困难的根源在于,他们始终认为任何被断言的道德判断都主要具有非认知主义,都不是对道德事实的“描述”,因此与以“描述事实”为特征的事实判断截然不同。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确实可能会通过道德判断来作出“评价”、“规定行为”或者“表达情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判断出场的一切情景都是非描述的(正如并非一切事实判断出场时语言情景都是描述的),人们往往还会使用道德判断来描述所谓的“道德事实”,更期待能够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获得各类“道德知识”。格巴德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现实生活中,以个体面貌出现的道德判断并不是孤立自存的,而是以其背后的规范系统为依据,而人们之所以作出道德判断并认为其合理,关键在于他们对整个规范系统是接受的。因此,人们对规范系统是否“接受”,这是特定道德判断能否形成或者形成何种道德判断的决定性要素,就此而论,道德判断是非认知的,它表达的是人们对其背后的规范系统N的“接受”,而不是在描述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第二,虽然道德判断表达的是人们对规范系统N的接受,但是人们一旦接受了该规范系统,那么总是可以在其内部考察各类道德判断的“系统性特征”。因此,格巴德提出,道德判断中的价值词“应该”“许可”“禁止”其实可以通过他所创设的纯描述性谓词“N-被要求的”、“N-被允许的”和“N-被禁止的”改写成描述语句,以刻画其在N中的特征。因此,当“禁止撒谎”被改写为“撒谎是N-被禁止的”时,人们其实是在描述“撒谎这一行为在N中具有‘被禁止’的特征”这一事实。不仅如此,既然在特定的规范系统中,道德判断可以改写成具有纯描述特征的句子,那么道德判断之间进行类似于描述句的逻辑推理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格巴德的观点予以扩展,就会得到这样一个十分有益的观点:道德判断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它确实可以用于表达情感态度、评价规约行为,从而与主要从事“描述事实”工作的事实判断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具有描述的功能,其描述的内容既包括其刻画的对象所具有的自然特征(这点已经为传统的非认知主义

^④ 这一点, C. 莱特 (Crispin Wright) 和哈尔 (Hale) 等人都已经发现了, 他们或是对布莱克本的观点予以批驳, 或是通过某种方式予以改良。(cf. Miller, 2003: 62—64)

者所承认), 也包括其在特定规范系统中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 并且在这个层面上, 人们可以进行如同事实判断一样的逻辑推理。

总的来看, 上述三位非认知主义者关于“弗雷格—吉奇问题”的解决方案表现出不断改进的过程: 黑尔把“意义”与“言语行为”直接挂钩, 因此他无法说明, 同样的道德判断, 何以可能在其被断言, 在从事了特定言语行为时, 与其未被断言而没有从事该言语行为时, 具有同样的意义。布莱克本力图通过其“二阶态度”论证表明, 道德假言条件句表达的是二阶态度, 而从句部分则是表达“一阶态度”, 因此道德判断不管其是否被断言, 终究都是在表达相同种类的态度, 但是他并没有解释清楚“态度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人们如何可能关于态度本身形成态度? 其关于“道德敏感性”的表述更是表明, 所谓“态度的态度”或许只是关于“具有某种态度”的信念的态度, 也只是一个“一阶态度”。这其实从侧面提示我们, 在特定的以非认知性因素(如情感、态度、接受的意愿等)作为成立要件的话语系统中, 上述因素可以通过某种可认知性的面貌出场, 即其可以演化成为关于某种情感、态度或者意愿的信念, 并且也可能成为另一态度的对象^⑤。而这一思路显然与格巴德所阐发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特定规范系统中, 将道德判断中的规范词改写为描述性语词, 将道德判断转变为描述性的句子, 从而可以有效地实现规范系统内部各类道德判断的逻辑推演。从上述解决方案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发现, 在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界, 在经历了与认知主义的长期对立之后, 现代非认知主义者尽管还在强调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区分, 但是其理论越来越多地具有认知主义的因素, 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 道德判断既非纯描述的, 也绝非纯粹非认知的, 在实际生活中适时地综合这两种特征, 才能对道德判断作出正确而全面的理解, 而当今西方元伦理学的新发展亦印证了我们的上述结论。^⑥

参 考 文 献

张曦, 2011, 《道德假言推理与准实在论的一个困难》, 载于《世界哲学》2011年第6期。

Blackburn, S., 1984, *Spreading the World*, Clarendon Press.

Copp, D., 2001, "Realist-Expressivism: A Neglected Option for Moral Realism",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vol 18, no. 2.

Geach, P., 1965, "Assertio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4, no. 4.

Gibbard, A., 1990, *Wise Choices, Apt Feelings: A Theory of Normative Judg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e, R. M., 1970, "Meaning and Speech Act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9, no. 1.

Miller, A.,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Metaethics*,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孟繁红)

^⑤ 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D. 考普(David Copp)教授提出的关于“实在论者的表达主义”(Realist-Expressivism)的观点中, 首先就包含关于“道德事实”的“信念”的肯定。笔者认为, 将一种“信念”作为具有实在地位的, 从而它既可以是“描述”的对象, 也可以是“态度”所指涉的对象, 这无疑对于理解上述关于布莱克本的观点的分析是有助益的。

^⑥ D. 考普的“实在论者的表达主义”可以被视为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表现。当然, 这一趋势亦可以被认为是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 乃至道德实在论与道德非实在论的妥协。(cf. Copp, 2001)